



易安华：「国将不保，何以家为？」

□ 袁慧晶



易安华画像。新华社发

“不灭倭寇，誓不生还。国将不保，何以家为？吾妻存之。”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厅内，陈列着一位壮烈为国捐躯的将军遗像，他就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7师259旅旅长易安华。在他一生的最后一役——南京保卫战开始前，留下了这封“告妻儿书”。

易安华，江西宜春人，1925年，易安华入黄埔军校，次年毕业，参加北伐。1932年，国民革命军第87师奉命赴上海作战，易安华率部在闸北一线阻击日军。1937年，易安华主动请缨上前线杀敌，参加淞沪会战，毙伤大量日军，遂升任第87师第259旅旅长。

1937年11月，上海沦陷，部分中国守军撤退至南京。同年12月，南京保卫战打响。易安华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，在光华门、通济门一线布防。此前，易安华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已被送回宜春老家。他曾派副官送给妻子一封家书，以诀别的口吻写下“告妻儿书”，不想竟成为绝笔。

在与日军血战三昼夜后，易安华身负重伤，但他依然忍痛指挥战斗。战士们见易安华伤势严重，几次要将他抬下阵地，他却说：“我是堂堂的中国军人，早已经下定决心，一定要与城共存亡，与士兵同生死，决不忍偷生以负国负民！”最终，在光华门外的阵地上，易安华壮烈牺牲，年仅37岁。

易安华烈士留下了三子一女，如今在世的只有小儿子易豪雄。在江西南昌西湖区的一个职工小区宿舍内，88岁的易豪雄指着客厅的一幅画像说：“这就是我一辈子没见、没喊过的爸爸，也是我的骄傲。”

父亲牺牲时，易豪雄尚在襁褓中，关于父亲的一切，他都是听母亲和大姐讲述的。“战时信息不畅通，父亲具体何时牺牲的，没有消息。1938年初，母亲曾带着大姐和我去湘鄂等地打听父亲的音讯，但没有收获。回老家后，乡亲们听闻噩耗筹备追悼大会，由于父亲没有穿将军服的照片，就在景德镇烧制了这幅遗像。”易豪雄说，瓷板画原件他已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，客厅里的这张是他翻拍的，想留个念想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易安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2014年9月1日，他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2015年9月3日，易豪雄作为烈士后人，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。

“父亲如果还活着，看见祖国强大，一定很激动。”易豪雄感慨，何其有幸，他替父亲见证了这一切。陪同易豪雄进京的大儿子易难还记得，那天坐在彩车上的父亲一直在鼓掌，热泪盈眶。

“名编壮士籍，不得中顾私。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”这首诗既是易安华追寻的人生坐标，也是他壮丽人生的真实写照。如今，宜春市化成岩森林公园内的易安华墓旁，常摆满鲜花，不时有群众自发前来祭扫。尊崇英烈、捍卫英烈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，英烈精神正融入民族血脉、焕发新光彩。

（新华社南昌8月5日电）

高凤英：浴血青山的抗战英烈

□ 贺书琛



高凤英画像。新华社发

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中心小学，教学楼前矗立着一座烈士雕像。他身着蒙古族传统服饰，风华正茂……这是烈士高凤英（原名德勒登）的雕像。他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、屡立战功的抗日队伍指战员、军民口中的“云队长”。

1928年冬，德勒登与赵莲莲成亲。次年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文贵出生。当年春旱秋涝，受压迫的穷苦人的日子更加无以为继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德勒登留学苏联的堂姐夫佛鼎回乡，这名共产党员受命回国发展内蒙古地下党组织。赵莲莲发现，常与佛鼎来往后，眉头紧锁的丈夫变得意气风发，时时不知疲惫地在外奔波。她不知道，丈夫有了新的身份——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婚后刚两年，一天早上，丈夫如往常出门，又折返回来，抱起儿子不停亲抚，临别时多看了几眼忙碌的妻子。赵莲莲没想到，这一别就是5年。德勒登与十几名有志青年同赴国外，系统学习了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基础科学等课程。1935年，为组织民众抗日救亡，26岁的德勒登被派回国，从事地下工作。出于工作隐蔽需要，他为自己起了一个与魁梧身材颇具反差的名字——高凤英。

地下党员高凤英四处奔走，为抗日武装力量争取支持。经过多次做工作，高凤英曾将一个排的蒙古族士兵从伪军阵营拉到游击队中。此外，他还争取大量物资支持，为游击队提供关键情报。

1938年春，为给游击队的机枪购置配件，高凤英乔装打扮进入敌占区归绥城（今呼和浩特市），不料被便衣警察逮捕，送进了日本宪兵队。赵莲莲心急如焚，四处求助。经过多方20多天斡旋，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高凤英终于得救。

几日后，敌军进村，还未痊愈的高凤英翻墙离去。不承想，赵莲莲被敌军抓走。她忍受折磨，咬紧牙关，不肯透露丈夫行踪。高凤英与弟弟卖掉家中骆驼，四处筹款，设法救出了妻子。

随着高凤英在大青山与敌斗争日趋激烈，敌人屡次受挫，加强了对其家眷的搜捕力度。赵莲莲在熟人帮助下，带着孩子进山与高凤英团聚，和游击队一同行军转移。据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高铁军采访记录，当年尚年幼的次子文精有些印象，常在黑夜随部队转移，父母制止他哭闹以防暴露行踪。此后他们经常寄居在游击队驻地旁的不同山村，被当地军民称作“游击家庭”。

1940年秋，高凤英受任蒙古抗日游击队队长，更名为“云吉祥”，被当地军民称作“云队长”。他带领一支由蒙古族群众组成的武装力量转战绥西地区。临行时，赵莲莲送别丈夫，多年后她仍记得当时对丈夫说的话：“你放心，我再苦再累也能顶得住，一定要把孩子带好。”那是她和丈夫的最后一面。

1941年秋，高凤英等12名游击队队员在与敌军战斗中牺牲，长眠于大青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为高凤英等烈士举办的追悼会上，已读小学的文精代表烈士子女发言。他说：“我一定会继承父辈遗志。”赵莲莲扶着灵柩，她多么希望丈夫也能看到他梦寐以求的新社会。（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4日电）

